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Producing Through Landscaping

A Decad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Tunpu Village from Southwest China

景观的生产

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



葛荣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oducing Through Landscaping

A Decad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Tunpu Village
from Southwest China

景观的生产

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

葛荣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观的生产: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葛荣玲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4729-7

I. ①景… II. ①葛… III. ①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概况—安顺市 IV. ①F592.7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312 号

书 名: 景观的生产: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

著作责任者: 葛荣玲 著

责任编辑: 武 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729-7/Q·01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176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异常和非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



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言人人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借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类分。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 and 法典，各种实



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辈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代际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2012年五四青年节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致 谢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彭教授是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也是我在人类学这个学科领域的启蒙者。2005年5月，我在湘潭召开的文学人类学年会上认识了彭教授，他的质朴、真诚与人类学思想的光辉深深地打动了我，由此我坚定地走入了人类学的世界。彭教授对他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术上以最前沿的理论进行指导，而且特别注重田野技能的训练。每到寒暑假，彭教授就会组织学生们到某个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这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人类学基本方法，而且近年来已经促成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田野成果。我对于龙屯的选择便是得益于一次在博士生求学期间的暑期训练。2007年夏天我跟随彭教授和同学们初到屯堡地区，一下子就被这个旅游村落的平凡又典型、矛盾又坚韧的性格所吸引，两年后我选择了龙屯来做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点。

特别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纳尔逊·格拉本（Nelson H. H. Graburn）教授，从2007年开始，他一直在对我的学术研究加以指导，对于我在龙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他让我看到了人类学既视野广阔又思维细腻的学科品性，帮助我开启了与世界人类学界对话的窗口。格拉本（Graburn）教授已经近80岁高龄，但是他对新鲜事物总是感到好奇，怀有一颗人类学者特有的赤子之心，对于年轻的中国人类学者也从来不吝指教。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厦门大学的石奕龙教授、张先清教授、宋平



教授、郭志超教授、余光弘教授的指教。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云南大学的杨慧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写作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本书能够得以出版，是由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经费资助，谨致谢忱。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的耿协峰主任、武岳编辑，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对他们心怀感激。徐洪舒先生、黄可立先生、李昆先生、黄茹女士为我提供了便利的田野调查条件，还经常慷慨解囊，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安顺学院的吴羽教授、张定贵教授、李建军教授向我无私地提供了他们在屯堡地区收集的宝贵资料和形成的研究成果。贵州人的豪爽、屯堡人的热情，让我终生难忘。

我最要感谢的是龙屯的所有乡亲。对于我长期介入他们的生活进行田野调查，龙屯的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之心。村委会和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我创造了田野条件，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一对普通夫妇主动提出来要做我的屯堡干爹和屯堡干妈，他们对我在龙屯的生活、安全、交友上给予了善良的建议和关照。神头、小嬢嬢、大嬢嬢们，还有太多太多的村民都被我反复打扰了许多遍，他们不仅是我的访谈对象，也成了我的朋友。2010年的春节，村民们盛情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过年，让远在他乡的我体验到了家的温暖。

我的同门兄弟姐妹以及其他院校的学人也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在心里默默感谢他们。

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在坚定、无私、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最了解我写作的每一步辛苦，分担了很多生活的压力，没有他们的理解和帮助，这本书稿不可能面世。

要感谢的人太多，能提及的却太少。就让我收笔至此，用心而不是用文字去表达我的感恩吧。

2014年3月于厦门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一、 地方、空间与意义 / 1
- 二、 一个“景区社会”的成形 / 8
- 三、 选题与方法 / 16

第二章 屯堡：一种语境 / 18

- 一、“屯堡”的诠释与过度诠释 / 20
- 二、屯堡人、老汉人及其他 / 35

第三章 由村落到景区 / 51

- 一、 乡民社会中的龙屯 / 51
- 二、 龙屯蜕变 / 62
- 三、 成为屯堡代言人 / 71
- 四、“龙屯的模子” / 74

第四章 空间流转 / 79

- 一、 景点：前台规范 / 79



- 二、 线路：游客规范 / 95
- 三、 区划：村落规范 / 102
- 四、 水土不服的规划案 / 109

第五章 出现裂变 / 116

- 一、 村落的视野 / 117
- 二、 四大家族 / 127
- 三、 家的纽带 / 135
- 四、 节日仪式的空间 / 140

第六章 精 英 / 147

- 一、 精英人物 / 147
- 二、 精英组织 / 157
- 三、 不以成败论英雄 / 167

第七章 小嬢嬢与游客 / 173

- 一、 景区生活 / 173
- 二、 作为文化掮客的导游 / 175
- 三、 游客想象 / 181

第八章 景区社会 / 192

- 一、 空间策略 / 192
- 二、 “家园遗产” / 201
- 三、 十年之后 / 213

参考文献 / 219

图 目 录

- 图 2.1 屯堡妇女 / 40
- 图 3.1 龙屯街区图 / 69
- 图 4.1 位于龙屯学堂的地戏表演 / 83
- 图 4.2 主要景点位置变化示意图 / 84
- 图 4.3 龙屯景区景点及路线图 / 96
- 图 4.4 龙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图 / 104
- 图 4.5 古镇、新村与樱花园 / 105
- 图 4.6 樱花园效果图 / 107
- 图 4.7 樱花园景观石 / 108
- 图 5.1 典公设译、建塘、立寨示意图 / 129
- 图 5.2 龙屯四大家族目前主要聚居区 / 130
- 图 5.3 三间房式三合院示意图 / 137
- 图 5.4 五间房式四合院示意图 / 139
- 图 5.5 丧礼中的绕灯仪式 / 145
- 图 7.1 龙屯简要亲属称谓关系 / 177
- 图 7.2 龙屯景区 2001—2009 游客数量统计及走势示意图 / 181
- 图 7.3 龙屯景区 2007—2009 年游客人数分布情况 / 183

第一章 绪 论

一、 地方、空间与意义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柯奈普（Ronald G. Knapp）等人对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的农村景观变迁做了一个梳理。广袤的中国农村，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90 年的 40 年间经历了几次大的政策性变革，包括复兴与土改时代（1949—1958）的平均主义分配，人民公社化与之后（1958—1964）的继续调整，学大寨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1964—1978）的农村运动等。自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8—1988），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商品经济，公社解散，农村走上了自由修建新房的改革时代。在经历了多次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农村建设的理念发生了转变，诸如“风水”之类的传统理念已不再具有大的影响。统一的、单调的“现代化”民居在不同的地方被模仿和复制，而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则注定会



日渐消亡。^① 20年后，我们看到的农村建筑景象印证了柯奈普的预测。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在全球化、现代性、流动性的社会语境中，社会的变革似乎比以往更加纷繁与不确定。或许是因为我们正好身处其中，因此对于社会的急速变革，体会尤其深刻。人们希望用“地方化”来抵制这种急速变革与全球化趋势，地方的意义变得重要起来。

而从哲学角度来讲，地方（place）是人类获得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人类获得“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一种手段。^② 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学的术语，一个物理性的实存，更是一种认知的方式，小到家园居所、村庄聚落，大到民族国家这种超越了面对面社会的超级社区^③，地方都是人赖以获取认同感的基本依据。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学者段义孚（Yi-Fu Tuan）曾提出，地方具有价值（value）和归属（belonging）意义^④，因此应该将地方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经验方式进行考察^⑤。

地方表达着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认同。一个地方的社群，在长久的历史积淀中产生了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及生存方式，寓居其

① Ronald G. Knapp & Shen Dongqi, "Changing Village Landscapes," in Ronald G. Knapp, ed., *Chinese Landscapes: The Village as Pla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pp. 47-92.

②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12.

③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983).

④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a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4.

⑤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中的人们从中习得相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同感。人们能够安居其所，因为这个地方正是自己的家园。“以‘地方’为单位的研究在当代人类学领域已经被公认为一种对传统研究单位的范式革命。”^① 地方构筑了有意义的社会空间，一段段社会关系在这里上演。于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变得重要起来。巴索（Keith H. Basso）对西阿帕契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田野调查，撰写了一本民族志《智慧坐落于地方：西阿帕契人的景观与语言》^②，生动展现了“地方”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之人的重要意义以及人对于地方景观的深刻体察和认知。地方、景观、语言、本地人，相互之间彼此嵌入、互生共存，远远超越了内或外、体认或凝视、记忆或观察的区别。所有要素之中，关乎一切的永远是人自身。

人们通过地名、历史、传说故事、景观符号来建构对地方的认同，又通过一系列空间行为内化和强化这种认同。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人类学者对于“地方”的关注角度发生了转变，认识到空间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③，空间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看来，人们的日常空间实践，如在街道上行走、去商场购物，同其他日常活动及特殊活动如仪式等行为一样，都是构筑自我认同的手段^④；通过不断的实践，人们将“外在于我”的东西纳入到“我”的范畴中去，也

①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0 页。

② Keith H. Basso, *Wisdom Sits in Places: Landscape and Language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6.

③ D. Lawrence-Zúñiga,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1.

④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984).



将自我的意义熔铸于地方之中。由此，构筑地方，构筑地方景观，也就是人们构筑意义的符号化活动。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的生产是由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来决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并由此提出了“社会空间”（social space）^① 的理念，特定的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的空间模式，这些模式可以被看做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投射，例如希腊城市的中心一定是空旷的、按照黄金比例分割排列的广场集市（agora），这样自由公民就可以汇集在“宇宙的统一性”当中进行交流，而罗马的城市中心（forum）则集中建造各种神庙、祭坛、监狱等等，投射出国家和人民的权力关系。

出版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街角社会》，描绘了意大利裔美国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两种分裂的社会类型——街角青年与青年大学生。他们分别占据不同的俱乐部和街区位置，这种空间格局在他们上初中的时候已经出现端倪。中学老师根据学习成绩将他们的座位对应划分开来，成绩好的孩子被分到了教室的第一或第二排，其他孩子则顺序往后排。少年社会首次划分的等级，似乎与他们成长为青年之后的社会角色分类隐含着渊源关系。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指出，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②，由一个中心瞭望塔和四周布满小囚室的环形建筑组成，它表达了空间的等级秩序观念和通过建筑图式对个人身体进行控制的政治理想。在福柯看来，空间、权

①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4.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24 页。

力与知识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结构化的组织如医院、工厂、学校等，以及对于城镇的整体规划，都是如此。建筑是一种政治技术，通过建筑，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通过空间的渠道被规整起来。在与拉宾诺（Paul Rabinow）的谈话中，福柯说：“空间是各种社群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权力实施的基本要素。”^①

人们在长期的空间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形态的地方景观，这些景观同样具有权力色彩。在《景观与权力》一书中，作者米歇尔（W. J. T. Mitchell）总结了景观与权力的各种关系^②：景观不仅是权力关系的符号化表征，更是实现文化权力的工具；景观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媒介，它用自然来表现社会文化结构，使人工世界看上去具有既定性而被理所当然的接受；景观不仅可以成为划分局内人与局外人认同的符号，还可以成为划分阶级、种族、性别的符号。这在旅游活动中是常见的现象，人们已经注意到旅游活动中潜藏的后殖民主义色彩，游客不仅将旅游地与原始、落后等概念联系起来，还希望这些地方能够按照自己的审美和休闲需要进行改造。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提出，地方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它的空间布局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个物品如果放在它应该放置的地方，那么它就是安全的，而如果逾越界限（out of place），那么它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肮脏的甚至危险的。例如食物，放在桌子上人们就认为那是合适的、可口的，而放在床上就很有可能

① P. Rabinow,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 252.

② W. Mitchell,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994), pp. 1-3.



被认为是肮脏的、不可接受的。^① 人的空间行为同样有这样的价值判断。人们要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才会觉得安全，到了公共的地方就得需要遵守那个地方的行为规范，而未经允许闯到了他人的私人领地里，则不仅是不合适的，还有可能为自己招来危险。在商场里、教堂里、广场上这些公共的地方，人们都要遵从相应的行为规范，而城市中的流浪汉则往往被人们所排斥，这体现了人们对于空间规范的认同。

一个社会的建成环境，包括家庭与个人的居所，以及公共设施和仪式的场所，是这个社会通过对地方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遗产^②，这些景观模式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建成环境改变之后，人们的行为规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有可能跟着发生变革。例如阎云翔笔下的下岬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重新装修和建造单元房，由此改变了村民的传统生活空间格局，原先那种敞开的院子、没有私密空间的房屋设置，渐渐转变为具有封闭院墙、客厅与卧房、主人房与客房相互分开的格局，相应地，邻里之间串门子也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直来直往了，否则就被视为侵犯了主人的“隐私权”。^③

简·雅各布（Jane Jacob）很早就开始关注现代城市规划的不合

① M.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Routledge, 1966.

② David Lowenthal, "Environment as Heritage," in Flint, Kate & Howard Morphy, *Culture, Landscap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Linacre Lectures 1997*,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0, pp. 197-217.

③ [美]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家庭、爱情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80页。